

·人物与书林·

## 柳诒徵的图书馆学思想及成就

范红霞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875)

**摘要:** 柳诒徵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卓越的图书馆学家,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图书馆事业,掌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达20年之久。在任国学图书馆馆长期间,他既重视对图书馆的管理与革新,使国学图书馆成为江南最著名的图书馆;又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研究,培养出一大批图书馆专家和文史学者;他主持编撰了《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反映了他的图书馆学思想,为学者提供了便利,也为其他图书馆树立了典范。

**关键词:** 柳诒徵 《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 图书馆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6)03-0108-04

### The Philosophical Idea about Library Science and Achievement of Liu Yizheng

**Fan Hongxia**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Liu Yizheng, a famous historian and librarian of China, committed himself to teaching and library science all his life. He had managed Guo Xue Library of Jiangsu Province for about 20 years during which he did his endeavor to the administration and reformation of library. His efforts entailed the most famous of libraries in the southward of Yangtse River. At the same time, his consideration on personnel training resulted in numbers of experts in library science and historiography. In addition, he took charge of compiling book catalog of Guo Xue Library, which was the embodiment of his philosophical ideas about library science, offering convenience for literates and setting apotheosis for other libraries.

**Key words:** Liu Yizheng; Book Catalog of Guo Xue Library; philosophical idea on library science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6)03-0108-04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晚号劬堂,江苏丹徒(今镇江)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卓越的图书馆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图书馆事业,曾历任江楚编译局、江南高等学堂、江南商业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等职。其著述等身,著有《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国史要义》、《中国商业史》、《中国版本略说》等。1927年夏,柳诒徵力辞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而应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后先后改为第四中山大学国学图书馆、国立中央大

学国学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之聘。柳诒徵自接管国学图书馆,到1949年辞职,先后担任国学图书馆馆长近20年。被认为是担任大图书馆馆长时间最长者,“比梁启超、蔡元培、陈垣诸先生担任大图书馆长都长得多。”<sup>[1]</sup>柳诒徵在图书馆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上,建树卓绝,贡献匪浅,不仅对当时的图书馆界、学术界影响巨大,对今天仍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因此,研究柳诒徵的图书馆学思想,不仅有助于学术的发展,而且对我们今天的图书馆建设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都将有所裨益。

收稿日期 2005-07-18,责任编辑 党燕妮

## 一 国学图书馆的组织与管理

南京国学图书馆的前身,是创建于1908年的江南图书馆,由柳诒徵的受业恩师缪荃孙和陈庆年筹划建立,并分别出任总办(相当于馆长)和坐办(副馆长)。1912年,改名江南图书局,1913年改为江苏省立图书馆,1919年改名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该图书馆自建立至1926年,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1927年柳诒徵接管时,图书馆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仅馆舍陋塌,且图书不齐备,管理松懈混乱。

1927年7月1日,柳诒徵正式到馆接收,他以绩学之士出任图书馆馆长,一方面带领馆员清查整理馆藏,一方面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并调整人事安排。针对当时诸多问题,他致函“大学筹备委员会”,主张图书馆应添设传抄、访购、印行等部门,改变了以往仅设保管、阅览两部的状况;提出图书馆存在的主要不足和解决办法,即藏书不完备,一些孤本钞本、四库书、近年新出之书、各种杂志、各学校团体所辑各书、官私统计报表,以及东西各国学者研究我国之书等皆所阙略;主张派传抄员到各地图书馆或私家抄录珍本孤本,或出费请各图书馆代抄。在允准后,他致函其他图书馆请求代为抄书,如请北平图书馆代钞《永乐大典》等,这样,进一步丰富了图书馆的孤本钞本。同时,对馆内的善本、珍本和孤本进行影印,避免了此类图书由于阅览所造成的损失,而且,可以防止由于不测之灾而失传。仅1927年至1934年间,便影印书60余种,其中经部5种,史部34种,子部8种,集部16种,且有相当数量图书都是当时的希见之本,如《南雍志》、《三朝辽事诗实录》、《洪武京城图志》、《严修能精写东莱书说》、《郑开阳杂著》等。另外还影印了馆藏宋元刻本、明代名贤手札等多种。

1931年,河南某人携其先祖所藏《明史》稿本至南京求售,自称是万氏改稿本。教育部编审处将原书送国学图书馆请柳诒徵鉴定真伪。柳诒徵虽审定其非万氏稿本,但认为其朱墨烂然,无论真伪,终为纂修过程中所留之难得珍本,便协同馆员“穷日夕之力录副”<sup>[1]</sup>以充山珍藏。柳诒徵增加馆藏,保存珍本图书的卓识和执着精神令人钦佩。

1928年,柳诒徵还编写出《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详细介绍了国学图书馆的缘起、沿革、环境、图书概况及特色、学界人物、规章制度等。同年11月编辑出版《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一年刊》,此后,直至1937年,每年出版一本。通过《国学图书馆小史》及《馆刊》,使世人不仅了解了该馆的历史,而且对图书馆的现状也有了较为明澈的认识,扩大了图书馆的知名度。

另外,对各项制度也进行了调整和修改。其一,制定了

住馆读书的制度和章程。视馆舍情况,读者只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即可住馆查阅资料,其缴费标准与馆员同。可见,柳诒徵完全以为服务读者为原则。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蔡尚思为撰写中国思想史,就曾于1934年9月至1935年9月住馆读书一年,获益匪浅,对此他感受颇深。他曾回忆,柳诒徵先生“首创学者住馆读书搜集资料办法,是开路先锋的创新者”,否则“我能得长期入住该馆遍读历代文集而成为今天的我么?”<sup>[3]</sup>于此,柳诒徵是打破了图书馆的先例的。此前,虽有住馆读书者,但多为官厅介绍或馆员友好,读者随意索取书籍,并没有制定相关的章程,随意性很大。而柳诒徵是将其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的,任何读者都必须严格遵守规章要求,既不允许将书带到住处,更不得携出馆外。其二,对善本书的阅览,改变了以前的严格限制,扩大了赠券、购券的范围。以前要阅览善本书籍,必须有省署许可,或馆中人认识的学术专家介绍。有资格查阅善本者极少,使善本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柳诒徵令人将善本重抄或影印,扩大阅读对象,对于发扬古代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二 选拔培养人才,开展学术研究

作为知名学者,柳诒徵深知图书馆对学者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国学图书馆所藏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武昌范氏木犀香馆、桃源宋氏三家之书,可谓旧籍非常丰富,有些藏书甚至是全国最大的北平图书馆所无。有鉴于此,柳诒徵主张将图书馆办成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列入大学区中,与研究院相衔接。基于此种理念,他接管图书馆之后,罗致四方学子,一方面令其整理管理图书,另一方面鼓励他们充分利用馆藏图书的便利条件,开展学术研究。为此,他于1928年创立《国学图书馆馆刊》,每年一册,以报告馆务,尤其是刊登馆员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如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王焕镛的《明孝陵志》,柳诒徵的《说文句读稿本校记》、《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社会志初稿》等,都曾在《馆刊》发表。在柳诒徵的倡导和带领下,国学图书馆不仅培养了一批图书馆专家,也造就了一批学术研究人才。如曾任印行部主干的缪凤林,后成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先后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史学教授20余年;访购部和印行部主干的向达,后任职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二所副所长、学部委员、《历史研究》等编委等,成为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和历史学家;参与编撰《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的王焕镛,后历任浙江大学、贵州大学、杭州大学等校教授,以及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浙江文史馆馆长等。因此,当年柳诒徵于

国学图书馆主持开展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活动，功不可没。

国学图书馆不仅重视馆内人员的培养，对到馆读书的读者，也非常关注其学术研究。尽量培养他们勤奋好学、踏实研究的学风。如住馆读书章程规定：“住馆读书者，非因疾病要事，继续满一星期不至阅览室读书者，得由本馆通知介绍人请其出馆。”<sup>[4]</sup>这样，以强制措施，激励读者勤奋用功多读书。如1934年蔡尚思到馆读书，为支持其学术研究，国学图书馆为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柳诒徵对馆员说：“蔡先生为了著大部头的《中国思想史》一书，特来我馆从历代文集中搜集他人所少搜集的宝贵资料。我们必须尽力支持他。他的贡献也等于我对图书馆的贡献。”<sup>[5]</sup>柳诒徵不仅为其提供方便，还经常和蔡尚思在一起讨论学术。柳诒徵奖掖后学的精神使蔡尚思终生难忘，多年以后，蔡尚思每念及在国学图书馆读书的岁月，总有无限感慨。“我从前只知大学研究所是最高研究机构，到了三十年代，入住南京国学图书馆翻阅历代文集之后，才觉得进研究所不如进大图书馆，大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对活老师来说，图书馆可算死老师，死老师远远超过了活老师。”<sup>[6]</sup>柳诒徵对人才的爱惜也极受称颂。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蔡尚思避居南京，柳诒徵仍到离自己居处甚远的蔡尚思住处看望蔡，作为晚辈的蔡尚思深受感动。这充分显示了柳诒徵对人才的重视和尊敬。作为一位国学大师，一位图书馆馆长，颠颠仆仆地去看望一个到图书馆读书的读者，这种尊重人才、爱惜人才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

### 三 新旧图书综合编目的目录学思想

在图书编目上，柳诒徵反对将新旧图书分别编目，主张将新旧书综合编目。1923年，柳诒徵向中华教育改进社历史组提出了“拟编全史目录议”的提案，提案中，柳诒徵建议编一全史目录，将近年新出之书以及新出土之物，合旧有之书，编一总目。1927年柳诒徵任职图书馆伊始，便向大学筹备委员会提出了将馆藏图书无论新旧合编一总目的主张。他指出，善本书目可仍使用民国初年江南图书馆编纂丁国钧、王懋谔等先后所编的《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而续提善本书及普通阅览书则应重新编目，因为“囊昔所编诸目，乃多与存书不符。或目存而书已他徙，或书增而目尚未沾，学者病焉。”<sup>[7]</sup>遂主张将此二种书目与善本各书目彙编成一总目。1929年1月27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金陵大学召开第一次年会，柳诒徵作为协会的监委，代表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向大会提交了“编制中文书目应将新旧书合编不宜分列新旧书为二目案”的提案。提案中，柳诒徵进一步重申了

新旧图书合为编目的思想，并说明了原因及具体办法。提案中阐明了新旧图书分别编目的不合理及危害，认为新书旧书本无显然的界限，“一一强为分别，必至多生窒碍。且长此分立，因循苟简，则新创之分类法，将无以产生。而今后之新目录学，恐亦无有试验而创造之者矣。”<sup>[8]</sup>在今日不废新旧书分立之目，则编目者必日趋穷途。且其势足遏新目录学之产生，为害匪细。”在他们看来，“书籍为学术思想之表征，任何学术，皆自有其源流派别。若以新出之书，编就旧类，或以旧书编就新类，似皆有其可相依附之处。”<sup>[8]</sup>所以，无论从学术发展，还是目录学的发展前途考虑，都应该将新旧图书合为编目。那么，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柳诒徵等人认为，不应坚持全国用一种方法，就编目方法，并无成法可以完全依用，应就具体情况参考中外编目方法予以改进。此编目思想，在30年代编撰《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时得以实践。

### 四 《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的编撰

中国目录学的开创者是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七略》创立了较为完善的目录体，它将图书分为六大类，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很明显，这种图书分类方法，不是很科学，分类标准也不一致，且对中国卷帙浩繁的史部书籍，多分归六艺略，显然不妥当。梁代逐渐普遍使用四分法，到唐代初期，魏征等撰写《隋书·经籍志》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自此以后，中国图书的分类，基本按照这种分类标准，偶有例外。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仍采用四分法。

1927年柳诒徵任国学图书馆馆长后，首先令范希曾（1930年由王焕镛继任）、汪调之、赵鸿谦等分别就善本、普通本和丛书进行编目。在此基础上，柳诒徵在张继曾、陈兆鼎、汪黼、朱建章等协助下，对全部馆藏合为编目，1935年底《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编成，1936年又编成《补编》，二总目共30巨册，收编全部馆藏二十二万三千八百四十八册。

《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以便于使用为原则，没有拘泥于传统分类方法，而是参酌中西分类方法，根据馆藏的实际情况，采用经、史、子、集、志、丛、图七分法。编者既不赞成守旧者“崇尚库目之桀，毫毛不肯少更”，也不赞成革新者废弃四部之名，完全采用西洋的分类方法。他们认为，六艺经传，意蕴弘富，为中国所独具，一概采用西洋分类法，如将易入哲学，诗经入文学，书、礼、春秋等入史学，只是“得其一而失其全。”<sup>[9]</sup>其将史部中的诏令、奏议、职官入政書類，更符合此类书的性质；将地理类中的方志，别立“志”部，则由于当时方志类图书数量极多，单独标目，无疑更便于检索。

为容纳新出书籍以及西方书籍,该总目增设类目和子目。如在史部中,增加专史、外国史和金石等目;子部下的类目加以扩充,以容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类书籍,如哲学、艺术、宗教、邦交、财政等。这无疑是对西方分类方法的借鉴和吸收,也是当时我国类分旧籍和新书最详尽、最合理的图书目录,其中蕴涵着编目者对中西图书分类思想的认识水平。也反映了国学图书馆同人不囿于成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科学思想和敢于突破常规、勇于创新的精神。《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的传记类图书一改《四库全书总目》按圣贤和名人标目的方法,采用体裁标目,表明柳诒徵等人突破了英雄史观的局限,能够客观、科学地看待古今名人的著作。另外,该总目将各类丛书的子目分归各类。集部的编次,以作者的卒年为断,便于定易代之际作者归于何朝。其分类也更加详善。《四库全书总目》只有“部”和“类”,“类”下不再细分分子目,而《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则于“类”下再分子目,将国学图书馆全部馆藏分成7部,85类,832属,这是当时我国分类最细的图书目录。

《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著录图书的范围和形式更为详备。它不仅著录中国典籍,且收录西方书籍,这比《四库全书总目》仅收中国图书以及1792年以前的图书,无论从所著录图书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有了极大的超越。当然,从著录图书的数量而言,《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无法与《四库总目》相企及,因为前者著录的毕竟仅为国学图书馆的藏书,但对每部图书著录的详细程度上,则较《四库总目》更细。《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不仅标明每部书的实存卷数,而且注出残缺之卷。单行本没有卷数的注明“不分卷”,丛书本来没有卷数者,则仅写书名,以区别单行本。卷数下著录编者姓氏、年代、籍贯、著作方式、版本、稽核等,读者查阅总目时,可了解每部图书的学术源流、刊刻先后等。卷数下注明册数,每部类属之后注明该部的卷册总数,以便阅者了解每部图书馆藏的大体情况。著录方面另一特色是,注明图书的馆藏地,如“善本甲”、“善本乙”,即表示藏于善本甲库、善本乙库,这样既便于读者查阅,也便于工作人员取放和整理。对同类性质的图书,按先全体后专篇的顺序编排,并以著者的时代为序。

当然,对《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的分类方法,学术界评价不一。客观而论,该总目确实存在不合理之处。如它仍未完全摆脱传统分类法的羁绊,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全部归入子部,显然不科学,也显得较为混乱,无法反映此类图书的本来性质,与现代的学科分类也极为不符。又如将中外图书综合编目,虽然可以反映时代特色,以及国学图书馆同人会通中西的思想。然而,当时中西学科分类不

同,西方图书,很难对号入座地放入中国目录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将西式学科纳入古类目中,显然不科学,而且,从便于检索的角度考察,于浩繁的中国图书中寻检为数有限的西方图书,实有不便。

尽管该总目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时还未有新的成熟的分类方法情况下,既不能沿用成法,又无新例可循,柳诒徵等人敢于突破长期以来的成例,对“四分法”和“七分法”予以增删,这本身就是一种尝试和革新,令人钦佩。更何况在当时技术设备简陋的条件下,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当时工作环境极其恶劣,“馆址僻左,频年经汉西门老米仓龙王庙军火失慎。复有外舰以清凉山为鹄,鸣巨炮,之者屡。当是时,山楼岌岌摇荡,同人震盪罔措,或中夜危坐,噤默不敢声。莫测息糜血肉何所,比侥幸无事,则又埋首就案。”<sup>[10]</sup>而且负责编目者并非专职,这反映了柳诒徵等人的胆识和敢于吃苦的精神,以及为读者服务和发扬祖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宗旨。更何况,与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当时确实已达到了较高水平,且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影响都是很大的。在当时能将全部馆藏图书编成一部能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图书总目;“自有图书馆以来”国学图书馆为第一家。<sup>[11]</sup>建国初期,顾廷龙先生掌管上海合众图书馆,明确合众图书馆编印藏书目录,分类采用南京国学图书馆的分类方法。他曾说:“1938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目录及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均将子目分类,国学图书馆之《总目》实导夫先路,在目录学史上应有一定之地位。”<sup>[12]</sup>

总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虽然仍以传统的图书分类为主,但却是立足于现实和实际的应用,以及未来发展的基础上,对我国传统的分类法和西方分类法,如杜威的十分法等,的折衷和创新,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是当时唯一将全部馆藏编目的图书总目,不仅为到国学图书馆借阅的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引领了我国图书馆界的图书编目工作。它不仅为我国新的目录学的产生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而且其图书分类和编目思想也充实了我国的图书目录学理论,为现代科学目录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柳诒徵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不仅在于对南京国学图书馆的治理和整顿,以及《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的编成,还在于柳诒徵为国学图书馆,即今天的南京图书馆保存和充实了古籍善本及影印本,以及各种重要的抄本和当时国内外重要的图书及杂志等,奠定了今天南图雄厚的图书基础。这些丰富的藏书为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南方学子乃至全国学人提供了科学研究的(下转第144页)

小册子最适合读后写“书话”的了。最厚实的一册是《腥风血雨·侵华日军江苏暴行录》,他说其中有日军掠夺和毁坏我国典籍文献的纪实。

我径直走入店内看书,海燕则先走到了店外的书摊。我发现,店里的一些书,如《古代白话小说选》、《晚清文学丛钞》、《金陵春梦》等,每次去南大周围旧书店淘书时都能见到,看来这些书也是南京旧书市场的“畅销书”。特别是香港著名报人、作家唐人写的《金陵春梦》,刚才逛仓巷其他几家旧书店时也见过。记得我家也有这样的一套书,是父亲以前买的。徐老师说,当年很多人手头都有这本书。

我还惊喜地看到两本《老残游记》,一本是齐鲁书社的,一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让我如见故人,因为它们和我以前买过的版本一样,不过品相比我的那两本却要好得多,这不得不让我后悔未能早点来此店淘书。

见老板娘的一个小儿子正钻在书堆里,随手拿起书本来嬉戏。看着他玩耍,我担心的是,他们要是把抓了旧书的小手放进嘴里吮舔怎么办?大概是为了转移小孩子的注意力,徐老师从提包里摸出一个大香蕉给了他。而我却羡慕着他这么小就开始“浸淫书香”了,他长大后会不会成为一个“读书种子”呢?离开“仓巷旧书店”时,我这么想着。

之后,徐老师带着我们又向前逛了三四家旧书店,陆续有所得,书包逐渐鼓了起来。

这一路下来,我也淘得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唐诗小札》(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10月版),作者刘逸生,据说是《白门柳》作者刘斯奋的父亲,他写《白门柳》三部曲,是有其家学渊源的;此书封面是著名书籍装帧家钱君香先生设计

的。不同于他惯用的以花鸟图案装饰的封面,此书的书衣以红色为背景,其上交错排列以“福”、“春”两个篆字。钱君香先生在《书籍装帧》(见《钱君香散文》,陈子善编,花城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一文中,曾点明他在该书以及《长征印谱》、《君香印选》的封面设计上运用的手法,是“学习了篆刻作品来作为设计的素材”,“别有一种风味”。

还有一本是金陵藏书家、作家薛冰老师的《青铜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1月版)。我先前写过采访薛老师的文章《家在六朝烟水间——访江苏作家、金陵止水轩藏书主人薛冰》(见《图书馆杂志》2005年第6期),也收藏有薛老师书话、随笔作品的签名本,但还没有他的小说,今日所获《青铜梦》可补此阙。买下此书时,我听站在一旁的书店老板指着书讲:“这个薛冰,常来这逛旧书店的。”薛老师淘书城南的雅事,我早已闻见,但从旧书店老板的口中听到“薛冰”二字,总觉得有点不同。

自从5月20日逛朝天宫“鬼市”旧书市场,以廉价获得几本书后,再逛旧书店时,总不免发出“老板要价高了”的牢骚。对此,研究旧书业的徐老师认为,我和海燕初来仓巷淘书,对老板来说是“陌生面孔”,所以他们喊的价比你们预期的总要高一些。再说,这些旧书,如果对比市场上该类题材新书的价格,算是便宜的了。

老师的话引发了我的思考。虽说“淘书城南仓巷间,岂能家家皆便宜?”而且对我辈学生而言,与旧书店老板讨价还价之乐并不可轻言放弃,但如能不断修炼得像徐老师那样,能以一份对旧书行业爱护之情和对从业者的理解之心处之,那么,收获更多的可能将是“旧书堆中获新知”的另类乐趣。

(上接第111页)丰厚“资料”,从而有利于我国学术研究和繁荣。同时,柳诒徵等国学图书馆同仁还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年他们所树立的勤奋、严谨、踏实的学术研究风气,为读者服务的宗旨,至今仍影响并鞭策着南图以及其他图书馆人员,也影响着全国的学人。

参考文献:

- [1][3][4][5]蔡尚思.柳诒徵先生学述[A].柳曾符,柳佳.勉堂学记[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42.
- [2]陈训慈.勉堂师从游踪记[A].勉堂学记[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83.
- [6]蔡尚思.中国文化史要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18.
- [7][10]柳诒徵.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序[J].国风月刊,

1935,(4).

- [8]南京国学图书馆.编制中文书目应将新旧书合编不宜分列新旧书为二目案[J].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二年刊,1929.
- [9]王焕镛.本馆图书总目叙例[J].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九年刊,1936.
- [11]许廷长.柳诒徵振兴国学图书馆[A].勉堂学记[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258.
- [12]顾廷龙.柳诒徵先生与国学图书馆[A].勉堂学记[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249.

作者简介:范红霞(1974-),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研究。